

◎作家近况

冯骥才——

莫道桑榆晚 提笔再出发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冯骥才80岁了。3月11日生日当天，他和105岁的母亲一起吃饭，面前摆着两碗简单的长寿面，母子二人对着镜头微笑，拍了一张合影。“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节点上，过得‘深’一点。”相比穿上唐装后变成一个寿星佬，旁边摆上果篮、鲜花，接受大家的鞠躬拜寿，冯骥才更愿意和母亲一起度过一段惬意时光。

他总是那么特别，和一些职业作家一生专注于写作不同，冯骥才是个多面手——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几十年来，他在其中倾注了无数心血，自称这几项事业是自己的“四驾马车”。近年来，他回归文学，在80岁生日前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多瑙河峡谷》和随笔集《画室一洞天》，既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也是奉献给读者的一份礼物。近日，本报记者对冯骥才进行了采访，请他聊聊对文学、绘画、生活的看法。

倘佯在文学与绘画间

冯骥才自幼喜欢绘画，十四五岁时，他求父亲为自己找一位老师。第一次见到严六符先生的画稿，他心想：“自己要能画一笔这样的国画多好”，从此便踏上习画之路。那时候去老师家上课，每周一次，下午或晚上。父母给他一角钱路费，坐公交花八分，过河坐摆渡来回两分，刚好。可冯骥才不舍得花钱，总是步行，省下车费去买各种绘画资料。几十年过去，他画室中还珍藏着当年购买的《中国绘画史》《画论丛刊》《水墨画》《李可染画集》等书籍，绘画的喜爱也伴随着他一生。

“我最早的身份是画家，画了15年画。现在还在画，但是不多了。”冯骥才说：“文学与绘画与我相伴半个世纪。这两样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从我的生活，到精神、情感乃至感觉，无不带着文学与绘画的特质。”

60岁时，他画了一幅画，大笔横扫中，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从面前奔腾而过，在波涛汹涌的江心，一只小舟逆水而行。那时的冯骥才，正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这小小而倔强的孤舟正是自己的化身。上世纪60年代的《北山双鸟图》和上世纪90年代的《银婚》，是冯骥才和妻子顾同昭合笔创作的，画中都有一对小鸟。2017年金婚纪念日，两人又不约而同走进画室，你画一笔，我添一笔，又是小鸟一双，又是秋叶如花，一幅《金婚》，处处是明丽而流动的色彩……这些与画有关的故事，被记录在《画室一洞天》中。以画室为发散点，冯骥才纪事状人、谈古论今、抉奥阐幽，留下艺术生涯和精神生命的痕心记。

冯骥才说：“我称书房为‘一世界’，称画室为‘一洞天’，这是《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两书得名的缘由。我自己有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做文字工作，此为书房；另一个空间用丹青干活，此为画室。两个空间的不同，不仅是工作方式的不同，更是心灵分工的不同。我说过，写作于我，更多



冯骥才近照



《金婚》
冯骥才 顾同昭绘

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

但这二者在冯骥才这里又是统一的。平素他用散文的笔法去绘画，用绘画的语言写散文，下笔的瞬间还会出现有如小说的构思与想象。他的绘画追求诗意，文学创作则注重营造看得见的空间、景象、人物，唤起读者的想象。冯骥才曾说，自己在写小说的时候，也要看得见人物面孔的细节。

“有写作灵感时，我会到书房里埋头写。可能写到一定时候，又产生了绘画的感觉，就又到画室里去。画室和书房在我家走廊的两头，这对我而言，是一个甜蜜的往返。”冯骥才说。

用审美的眼睛审视世界

从《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到《三寸金莲》《神鞭》《俗世奇人》，冯骥才始终与当代文学同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转身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冯骥才很难再四处奔波，于是重回文学创作，迸发出空前的创作热情。《单筒望远镜》《俗世奇人全本》《书房一世界》《艺术家们》……不断问世的新作，给文坛带来惊喜。

2020年出版的《艺术家们》，是一部追求真善美的长篇小说，塑造了楚云天、洛夫、罗潜等艺术家形象，呈现出他们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其中既有艺术家们对美执著不弃的追求，也有在时代浪潮冲击下，不同价值观与艺术观之

间的碰撞、冲突，不同人物之间天差地别的命运沉浮，但小说观照的核心始终是美。

“我眼中真正的画家，为了艺术、为了理想可以一切都不要。我把这样的艺术家写进了小说，就是楚云天。他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冯骥才说。“楚云天”的原型，是一位名叫李伯安的画家。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与李伯安结识，认定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是一位奇才，他当时正在创作的百米巨制《走出巴颜喀拉》将成为杰出的人物画。尽管遭遇冷落，李伯安依然执著地追求着纯粹的艺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冯骥才。

“在写完《艺术家们》之后，我发现自己没法从那部小说里出来，尽管我还有别的想象。《艺术家们》使我钻得太深了。我们这一代搞艺术的人，我们的精神、心灵的经历都钻得太深了。”冯骥才说。

怎么办？下一部作品如何继续？冯骥才想要钻出来，摆脱束缚。他开始写《木佛》，换了一个角度，把物人格化，变成有精神、思考、灵魂的一个人，通过“物”来写“人”。“这使我钻进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当我慢慢进入《木佛》这个小说后，我就不知不觉从《艺术家们》退出来了，这个感觉特别好。”小说《木佛》讲述了一个古老董的奇遇，木佛冷眼旁观形色色之人对自己的态度，看到大多数人请佛、拜佛，都是为了私心和功利，而非真正信佛、礼佛。心中有佛与家中有佛形成了一种反讽。

写完《木佛》之后，冯骥才觉得自

己自由了，又冒出很多想法，一口气写了《跛脚猫》《枯井》《我是杰森》《多瑙河峡谷》，都收入新书《多瑙河峡谷》中。

相比寓言化风格的其他几篇作品，小说《多瑙河峡谷》更为写实，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苦恋。突然取消的行程，让身为舞蹈演员的女主角肖莹对身处异国的恋人产生误会；一场意外，更导致二人无缘再见。多年后，肖莹的家人得知真相后，又该怎么办？小说在结尾发出“为什么还去追问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经得起追问”的感叹。

“一个作家写小说很多时候来自于对生活的感觉。我们会感到阴错阳差，我把这种感觉用《多瑙河峡谷》呈现了出来。里面所有主人公都是无辜的，但有一点是珍贵的——他们的爱情。而爱情，是多么美好啊！”冯骥才说。

“创作是我内心的需要”

上世纪70年代末，冯骥才初登文坛，并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创作的爆发期。他回忆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时我的创作充满激情，一年写几十万字。后来实在扛不住了，大病了一场。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先生给我来信说，冯骥才你一定要活得久，你只有活得久，才能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看透了、经历了，对人生的理解才会更深透，你的人生才会更丰富、更深厚，你的作品才能更有分量。”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冯骥才出版了百余部作品，二三十种外文译本。他的人生更丰厚了，也愈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文学。

“在主要精力放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那些年，我经常有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但没有时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路上几个小时，脑子里文学的想象就出来了。我会在心里把过去想过的某一个细节拿出来，在大脑中展开联想，生发出更多情节。在想象进行到一半时，就到站了，文学的想象也断电了。”冯骥才说。那时候，看到同辈作家出新书，他心里也会有一些苦涩。现在，他有时间了，过去压抑、积累了20年的想法和灵感一下子喷涌出来。

“以前创作是跟读者一块认识生活，现在我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艺术品。人到了七八十岁，能感受到过往的一切喜怒哀乐，最后变成了一种诗意、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冯骥才说。

80岁的他，尽管感到体力不如以前，但做起事来还是很有劲。在冯骥才看来，过往的人生如大河激荡，人可以在水中游、在浪中翻，有时还兴风作浪。到了80岁，开始往下沉，是那种静水流深的感觉。

“对我而言，创作不是别人让我写，而是从内心产生的一种自发的愿望，是我内心的需要。这种动力主要来自于热爱，对文学、对文字、对审美创造的热爱。我喜欢用笔墨丹青挥洒出意想不到的形象和意境，也喜欢在‘书房一世界’里享受写作的快乐。”冯骥才说：“我希望再多点时间，想做的事太多。”

漠的梦想”（《对峙》）；看见那一辆在训练场怒吼的坦克，诗人感到那坦克的履带是“挂满风暴的鼓”，而“另一条履带上，生长宁静的花蕊。炮塔在旋转，这里是台风的中心，热带风暴在钢铁的丛林中酝酿……战斗室里永远是没有风景的夏天，汗珠在额头上茂密如夏夜池塘的蛙鼓。/我们在奔驰，带着雷神和大海”（《坦克》）。这就是刘笑伟的军旅诗歌带给我们的英雄本色、正大气象和雄浑之美，其中也深深铭刻着军人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面对诗歌，刘笑伟始终怀抱自我革命的精神，他逼迫自己交出偏执、自私、落魄和“试图拯救世界的心”，他要求自己“善待每一个人”，“用善良和慈悲/宽容和耐心/慢慢打磨生活的诗意”（《内功》）。在这样的打磨中，每一个方块字在他心中、笔下“都是一个成卒”，“让每一个汉字都穿上盔甲/闪耀青铜的色泽”（《调兵》），而诗人就在这样的字节跳动之中，以点铁成金之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点金山”，山中嘉木参天、果实芬芳。

刘笑伟的军旅诗歌中“有盐，有黄金”，诚如他所立下的誓言，“我把军旅岁月走过的路、吃过的粮，/全部化为体温，化作酒，/折叠出纸上蜿蜒曲折的诗行”（《我的军旅诗》）。而这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诗行，也足以让笑伟的军旅人生珍贵无比，且铁骨铮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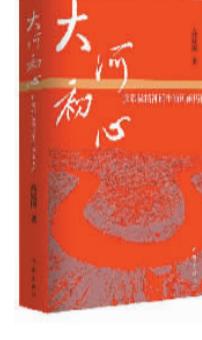
焦裕禄是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干部应该是怎样的人，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突出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焦裕禄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在军旅作家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中，作者给出了答案。

《大河初心》以黄河历史文化为背景，追索焦裕禄在出生和成长地——山东北崮山村和河南兰考的踪迹，深度探寻、挖掘感动无数中国人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成长历程，是一部为焦裕禄精神寻根立传之作。从南路上的文艺青年“小焦”，到工厂车间里的“焦主任”，再到主政兰考的“焦书记”，作者从党性与民族美德相融合的新视角，着眼焦裕禄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全面而艺术地还原了焦裕禄的人生轨迹。在高建国笔下，焦裕禄的形象是生动鲜活的，他也愿意唱歌跳舞，愿意吃“大虾饺子”，善于“烧黄鱼”，会做“海鲜熬豆腐”……然而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将这一切原本可以拥有的人生享乐毅然舍弃。

焦裕禄去世后，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说：“兰考一天也离不开焦裕禄，可在全县除‘三害’斗争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突然撒手走了……为什么老百姓对焦裕禄比亲人还亲？就是因为头拱地为兰考父老乡亲造福，是兰考人民名副其实的好儿子！我们跟着老书记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当年听取兰考县委一班人对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意见时，几个人都哽咽得读不下去，“念稿人一个比一个哭得厉害，出席和列席会议者干脆放声悲哭”。这些丰富的细节被作者如实记录在书中，充分彰显了焦裕禄精神的巨大感召力。

此外，《大河初心》还浓墨重彩地呈现了焦裕禄被穆青等人发现以及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之后的巨大影响，塑造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以及穆青、李庄、冯健、周原等新闻工作者形象，还原了他们为宣传焦裕禄优秀事迹、弘扬焦裕禄精神所做的种种努力。这部作品对焦裕禄早期成长经历、他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前后经历及传播过程的挖掘与披露，不仅内容新鲜生动，而且具有史料价值。

据了解，该书出版一年半以来，已重印3次，充分彰显了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



◎创作谈

寻访仙境之旅

哲 贵

《仙境》是我最近4年短篇小说新作的合集，共10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和我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样，还是信河街。现在想来，当初将信河街设定为小说地名，并没有“远景规划”，更没有深远的寓意。就地取材而已。那时，我还在温州一家报社工作，信河街是温州商业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温州最早一批做百货和服装批发的人，就是从这条街起步的。那些人中，不少成为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因为工作原因，我有机会接触他们，并有了深入而持久的交往。所以，当我准备写小说时，很自然地，那些商人就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而曾经“解育”他们的信河街，便成了小说发生地，成了我的文学原乡。

到底是他们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他们，讲不清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呈现他们？或者换句话说，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什么？能以文学的形式，提供什么有别于他人的角度和内容？

有评论说，我小说的一个主题是：当物质问题解决后，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不反对这种说法。确实，我小说的大多数主角是商人，而且是成功商人。但我不太关注他们如何成功，也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多描写。有人说，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原型大多是我的朋友，我不写他们的发迹史是因为“下不了手”；也有人说，我跟那些人物走得太近，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们的“前史”。不是的。成功商人的“前史”，我是感兴趣的，谁都有一个八卦的心啊。但那不是我的文学“议程”。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当他们成为商人、特别是成功的商人后，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当然，我不会“异化”他们，他们的前提是“人”，其次才是“商人”，再其次才是“成功商人”。人是他们的根本属性，商人是职业特性。

话说回来，当下的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物质贫困，所以从大的方面说，我们面临的几乎是相同的问题。

《仙境》这本书的发生地依然是信河街，只是小说人物的身份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有唱戏的、做京剧盔头的、做木雕的、打渔的、画画的、做酒的、行医的、卖书的、当服装设计师的，等等，他们共同的身份是手艺人，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商人，他们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商人，还是手艺人，他们的生存处境，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处境。他们的欢乐和忧伤，差不多也是我们的欢乐和忧伤。

所以，《仙境》这本书也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一个设问：什么是仙境？如何才能抵达仙境？坦白说，这本书里不会有这样的答案。我估计这样的答案任何书本里也不会有。每个人对仙境的理解和想象各不相同，但我要说，在《仙境》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能，仙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每个人的身上。通过“发现”，通过“努力”，每个人都可能抵达自己的仙境。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军旅生活跃动出的诗行

——读刘笑伟诗集《岁月青铜》

丁晓平

刘笑伟的诗歌是有情之作，他以充沛的热情和火热的激情，拓展了军旅诗歌的意境之美。无论是革命历史，还是现实生活，诗人往往从具体感受入手，触摸深层次的生命流动，然后把丰富的人生意蕴灌注在精巧细腻的形式之中。比如《齐步走》《拉歌》《手榴弹》《坦克》《勋章》，再比如《北斗》《巨浪》《东风》《极限深潜》等，写的都是军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或现代科技装备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可是经过他的点染勾画，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和韵味。阅读他的诗作，我们的五官突然灵敏起来，平时感觉不到的声音清晰入耳，平时闻不到的气味浓郁扑鼻，显露出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充满生命力、战斗力的军营。在西沙“祖国万岁”的石刻前，诗人写道：“用钻头、锤子和刻刀/在我身体里凿出的颜色/把他这片红，深深插入礁石和我的血液/让我每天的心跳/和南海的波涛一起/汹涌澎湃，响彻我和我的祖国”（《描红》）。面对一匹草原上的蒙古马，在对峙和凝望中，诗人“自己背上也长起驼峰，储存了一个小小湖泊的水/隐藏着徒步穿越沙

漠的梦想”（《对峙》）；看见那一辆在训练场怒吼的坦克，诗人感到那坦克的履带是“挂满风暴的鼓”，而“另一条履带上，生长宁静的花蕊。炮塔在旋转，这里是台风的中心，热带风暴在钢铁的丛林中酝酿……战斗室里永远是没有风景的夏天，汗珠在额头上茂密如夏夜池塘的蛙鼓。/我们在奔驰，带着雷神和大海”（《坦克》）。这就是刘笑伟的军旅诗歌带给我们的英雄本色、正大气象和雄浑之美，其中也深深铭刻着军人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

刘笑伟的军旅诗歌中“有盐，有黄金”，诚如他所立下的誓言，“我把军旅岁月走过的路、吃过的粮，/全部化为体温，化作酒，/折叠出纸上蜿蜒曲折的诗行”（《调兵》），而诗人就在这样的字节跳动之中，以点铁成金之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点金山”，山中嘉木参天、果实芬芳。

刘笑伟的军旅诗歌中“有盐，有黄

金”，诚如他所立下的誓言，“我把军旅岁月走过的路、吃过的粮，/全部化为体温，化作酒，/折叠出纸上蜿蜒曲折的诗行”（《调兵》），而诗人就在这样的字节跳动之中，以点铁成金之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点金山”，山中嘉木参天、果实芬芳。

刘笑伟的军旅诗歌中“有盐，有黄

金”，诚如他所立下的誓言，“我把军